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六期 ——
(二〇〇三年七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307a)

【研究报告】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王友琴
【史海钩沉】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 (二之一) 贾兰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候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 王友琴 •

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

1、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北京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说，“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1966年8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图景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南海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持，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份。

这是一个形像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2、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四年以后、刘少奇死去11年以后，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

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像”。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还是党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1980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着《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像”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它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理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

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181—182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人民日报》在1978年以后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中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们能公开地发表声音，绝大多数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报》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满篇谎言之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删改大惊小怪。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3、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4月，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30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8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9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1968年夏，刘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11月13日，刘少奇死亡。

7年以后，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么？中国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着，在1980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有人觉得这种排列很奇怪，为什么周恩来在刘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刘后面的，也有人说，周在林彪死后，也是第二号人物，和刘一样。其实，这也是一般人无可置喙的，人们不过议论议论罢了。在没有电脑互联网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书面文字讨论这样的问题，只

在口头谈谈而已。

官方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像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1988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1967年，只有一句话：

“1967年7月18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285页）

已经1988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年7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489—491）。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1999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4、中国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续，还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应该怎样解释？

一种思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专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谋害、杀戮的血腥史实，是大量的，特别是在新朝代初创的年代。

春秋时代，吴王杀伍子胥，越王杀文种，都是例子，成语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对皇帝立有大功的大臣，后来被杀的，可以数出一长串。秦代有李斯，汉代有韩信，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害死了从小一起放牛的大将军徐达，处死了宰相胡惟庸，并且从此取消了宰相制度。太

平天国一在南京建都，称“万岁”的洪秀全就杀了“九千岁”杨秀清。

这是军事杀戮、获取政权以后的又一次杀戮，可以称为“第二次杀戮”，是杀戮内部高层领导，最高领袖的战友。与土匪的内部火并有所不同，这些杀戮是通过某些司法程序的，如审讯和判刑，对被杀戮者，也都诉诸文字的罪状罗列，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据，尽管理由和根据，实际上都可能是伪造的。

司马迁《史记》的《李斯列传》载：“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口，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到秦国，辅佐秦始皇攻打吞并天下，被任命为丞相。之后他又建议焚书坑儒。秦始皇死后，他帮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夺得皇位。两年后，李斯以叛变罪被判决死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司马迁记载了李斯被杀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怎么了解到李斯关于带狗打兔子的临终谈话。不过李斯是当众被处死的，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报导。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导的刘少奇最后的话，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直至刘少奇死亡，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这方面，文革也比暴秦还要残忍。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斯大林是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它六个成员，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杀，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1937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1938年2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在1938年14日被枪决。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当，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帮助斯大林制造谎言，但是仍然被处死。

1967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斯大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

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37—38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而且，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抬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1971年9月逃离中国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这是偶然的相似吗？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中国的皇帝虽然杀戮“功臣”，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动员全国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来挥拳高呼“打倒刘少奇”。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

5、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

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1966年7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

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像，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崇尚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哲学。1970年，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不懂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理解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云游世界的和尚。）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还傲慢地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

“无法无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于道德。传统中国人相信，每天行为是善是恶，都在“天”的监察之下，对“天”的畏惧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奉行“无法无天”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任何恶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泽东向往并实施“无法无天”，也许正是传统在中国崩解的一个明显例证。他用“无法无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到1971年，毛泽东不但害死了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也把他身旁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这种自觉追求的“无法无天”哲学该是他支柱之一。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那些以迫害人为职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时，有一段议论，他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归结为饮食和性是不够的，应该加上一项：权力。他引述了托尔斯泰是怎样描写当一个人对自己面前的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时的那种快乐，这也就是那些“肃反”人员所得到的快乐。

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只写了短短的一页。他并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不过，不但苏联的故事可以给他的说法提供大量证据，中国文革的故事也可以为其提供大量证据。仅本文提及的几例毛泽东很琐碎的批示便显示，对毛来说，生杀予夺是相当有乐趣的事情。

6、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时候，他被指责为派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阻碍了文革。这种说法当时占有绝对强势。由于没有清算文革历史，这种说法在文革以后还有相当影响。

刘少奇子女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还在强调，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的决定是刘少奇请示毛泽东以后作的。刘少奇的子女要说明，对刘少奇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没有自作主张去作毛泽东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在为其父辩解时所用的逻辑是，如果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了，就不是刘的错。他们不把法律和道德当作评判事情的准则。

事实上，如果承认文革是罪恶，那么对刘少奇以及继任他的位置的林彪来说，他们的主要

罪责应是他们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时，都充当了毛泽东推动文革的第一号助手，也就是第一号帮凶。

事实非常清楚，派工作组就是为了发动对教员和学校领导人的攻击。若仅仅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依靠原来的学校领导人足矣。1957年，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划成“右派分子”并对他们实行严厉处罚和迫害，非常顺手，毫不困难。

上文已经说到，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制定“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6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暴力事件，后被称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范围内，一些学生和工人“斗争”了几十个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把他们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戴高帽子，把厕所的污物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拳打脚踢，等等。

笔者访问过“6 1 8 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他说，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35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移动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并不因此止步，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一点绳子的紧勒，没被勒死。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6 1 8 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紧接着，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编号是中发〔66〕392号）撤销载有刘少奇上述批语的文件。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立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全国。“6 1 8 事件”被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发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尸体堆积在火葬场来不及焚烧。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残酷事件。

刘少奇也在此时失去了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清楚：发动暴力迫害和罢黜刘少奇，是同时发生的。

刘少奇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他积极推行“5 1 6 通知”，甚至亲自组织北师大一附中“斗”校长刘超，他只是反对北大“6 1 8 事件”，反对“乱斗”。当他因工作组之事被毛泽东指责之后，他很快作了自我检讨，他没有表示异议——至少我们至今看不到这样的史料。

刘少奇平反后发表的文章里，描写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斗争”后押回办公室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似乎义正词严，场面也够戏剧性，但读者们却会质疑：这时候刘少奇想到宪法了，他早干什么去了？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都发生了，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什么？难道刘少奇真的以为，那部宪法并不需要实行，而是要等到他这个国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实行？

老百姓并不糊涂。不过，这种质疑不会被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里。

7、“揪刘”的“造反派”的下场

1967年7月8日，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当时称作“揪刘行动”。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海”。

发起这一行动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他们甚至举行了“绝食”行动以制造轰动效果（假的）。

当时的场景是颇为壮观的。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这是从毛泽东的诗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一轮“清查516运动”中，1967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运动”的逻辑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已经被“打倒”，戚本禹曾经出面直接支持“揪刘”，学生领袖在“揪刘”中和他接触，所以就是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在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正式“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一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20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头头之一。

文革的沉重铁轮可以碾死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及曾经攻击刘少奇有功的20岁的年轻大学生。

董临平的死亡，其实和刘少奇的死亡有内在联系。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整个社会奉行非正义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试图制止非正义，则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

□ 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6月号

~~~~~

# 【史海钩沉】

## 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

——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二之一）

• 贾兰勋 •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我从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跟共和国的一位缔造者、国家主席刘少奇联系在一起。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走进了中南海。

之后，又来到少奇同志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直到少奇同志含冤被迫害致死。其间，我亲眼目睹了少奇同志从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全过程。这段惨痛的岁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整理成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我对少奇同志的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 ◇ 出访归来

1966年的3月份，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回访西亚各国。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工作。3月8日，我们从北京起飞，先到新疆乌鲁木齐适应气候（因为第一站是访问阿富汗，从这里过去）。整个行程包括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那时是一个国家，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前前后后一共是40多天。就在这40多天里，国内政治生活发生着变化，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4月中旬，访问最后一站缅甸后，回到昆明。当时少奇同志对光美同志讲，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咱们转转云南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

这个计划刚刚安排好，我记得是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少奇同志吃过饭，又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主席的电话。主席要他马上到杭州，出席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不及休整，也没时间细细欣赏春城美丽的风景，我们又随少奇同志从速起程，赶赴杭州。为了保密，飞机停在上海，改乘汽车赴杭州。

在由昆明去杭州的路上，光美同志对我说，我们由国外带回来的水果，到杭州后分别送给常委们尝一尝。另外特别对我说，少奇同志叮嘱要送给彭真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份。

到了杭州后，当我往彭真同志处送水果时，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他告诉我：“住在西泠饭店的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当我到了彭真同志的住处，整个一层楼静静地，没有一个人。我见到彭真同志的卫士孙孝连同志后，他惊奇地对我说：“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这里！”我说：“这水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叫特意给彭市长送来，请他尝尝。”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态，我放下水果，也没有再说什么话，孙孝连同志忙说：“谢谢了！我不送你走了，你自己走吧。”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非常吃惊，心想太严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下楼来，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对我说的话，一时疑惑不解。

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分送常委，体现了少奇同志细腻、真诚的性格特点。特别叮嘱送彭市长一份，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他出国访问几十天的时间里，昔日的战友、工作伙伴一下子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始料不及或者说是深感惊异的。

1966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少奇同志赶到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杭州会议上主要是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问题，当时，由陈伯达、康生一伙起草，点名批判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由毛主席修改定稿。后来我们知道，在1966年的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就已经对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表示不满，批评它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北京市委也提出批评，说北京

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浪又使多少人失去理性，多少家庭一夜间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等我们4月底回到北京，北京的气氛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主席仍不在北京，少奇同志与周总理、小平同志主持一线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前沿位置。这一时期，明显感觉少奇同志比以往更加繁忙，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听取一些单位和部门的情况汇报和工作意见，查看、批阅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件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办公桌上都摞成了小山，本来就缺少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更显紊乱了。望着少奇同志奔波忙碌而不知疲倦的高大身躯，我们都有点替他吃不消。

作为贴身卫士，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的日常起居。这时，我们只有更细心、更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为他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比如，少奇同志批阅文件时多用铅笔，我们就及时削好一摞备用。少奇同志工作讲究效率，讲究秩序，只要他一按电铃，我们就迅速进去，送上新的，撤下用过的，不需言语交代。出门开会，我总记着多带几包茶叶，因为少奇同志常常睡眠不够，有时要靠浓茶提神。少奇同志办公有个习惯，即在睡觉前，还要把一部份文件拿到卧室，用相当一段时间继续批阅。值夜班时，我注意到，本来就关得很晚的卧室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少奇同志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仅靠安眠药都不行了。为此，我们也曾想尽办法，最后“发明”了一招——找来一种浓度很高的绍兴米酒，配合安眠药的使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晚上都要喝两次，才能保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惟一作为调节身心的晚间散步，也不像以前那样雷打不动了。在护卫少奇同志散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时常现出凝重和沉思的神情，脚步也不似从前那么轻快了。少奇同志一贯以稳健沉着著称，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焦虑烦躁的情绪也不时困扰着他。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同志被免职。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5月16日通过时只字未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不民主的现象使少奇同志隐隐有一种不安。而这次会议与以往惯例大不相同的还有，会议情况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汇报，而以前都是由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直接向主席汇报的。一时间，康生等人成为远在外地的主席了解中央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此后，《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情况也开始在社会上不脛而走。

联想到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到后来开始的对“三家村”的大加挞伐，以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言论”的定论，人们逐渐感觉到在文化领域正在涌动的波澜，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作为中央首长身边的卫士、身处中南海国家中枢所在地，我们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也明显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沉闷和紧张。

从这一时期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些会议、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除了

抓紧了解自己出国这一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再就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去办，他希望能尽快领悟主席的思想意图并能跟上节拍。但现实的情况则并非向他的良好愿望发展。

#### ◇ 国家主席的困惑

翻开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发表在显著位置、赫然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极富那种所谓时代特色的高亢语调和攻击性语言号召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傍晚时分，人们又从广播中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气势汹汹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篇社论和大字报的出现，不但使中国的老百姓惊诧莫名，也使主持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深感意外。因为这两篇东西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陈伯达、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出笼的，毛主席没有通过少奇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之，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又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一时间，一种充满火药味的异样气氛迅速弥漫开来，造反浪潮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战幕。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险恶阴谋下，高等院校成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和重灾区。往日书声朗朗、清幽宁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造反有理”成为还处于成长期的相当多的年轻人极易接受的新的人生信条。人人不甘落伍，争当冲锋在前的战斗小将，埋头读书学习，被看成是思想落后保守，不求上进的表现，遭到耻笑。一种似乎是潜在的狂热被激发出来。“砸烂”、“打碎”、“横扫”，成为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语汇和实际的行动纲领，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其后更是形成了文革中蔚为景观、也是最具象征性的红卫兵组织。南下北上大串联，誓死保卫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壮举。其他战线也无一幸免，很快出现混乱局面。打、砸、抢成风，派性武斗导致无数无辜群众命丧黄泉。风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从此国无宁日。

这时各大院校纷纷成立了战斗队、造反兵团，有的虽还没有成立，还是成班、成系的建制，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地区最早形成两派组织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有几个学生，把他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写成一个简报送到中南海，要求给少奇同志看。时至初夏，天气闷热，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告诉我，要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看看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是新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李雪峰陪着去的。

建工学院当时在北京东郊一带。我们吃过晚饭去了以后，天已经快黑了。走进学校的大门，只见灯火通明，院子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拉起了电灯。道路两侧，教室楼前，到处是用木头和席子搭起的架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五花八门，连成一片。最常见的是对教授专家的攻击谩骂，也有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攻击。不过这时感觉还算有秩序，还没有彻底大乱。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少奇同志放慢脚步，认真观看，不时眉头紧蹙。不多久，就被学生们发现，围拢了上来。学生们要求少奇同志讲话。于是，少奇同志就站在贴满花花绿绿大字报的木架子前讲：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少奇同志大致讲了他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他希望分成两派的同学团结起来。其中特别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你们在运动当中，要注意保护少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建工学院的一部份同学听了他这个观点很受感动，纷纷向少奇同志投去敬佩的目光，有的还在底下交流：对，说得有道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前后也就一个小时，因为被发现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就动员他不要再看了），临上车，有部份同学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汽车，一边向少奇同志招手致意，一边高喊了一句：“刘少奇万岁！”这件事后来叫中央文革的人知道了（可能简报就上去了），更加重了对少奇同志的嫉恨。

这期间，少奇同志还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先后到运动势头很猛的北京大学校园和清华大学校园看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进一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时，乱批乱斗的势头已经愈演愈烈，许多教授、专家及学校领导被当作坏人揪出来示众，有的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甚至罚跪、随意抄家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学校领导班子已不能正常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嘴里，少奇同志也了解到一些可怕的情况。对运动初期显露的这种混乱和过激的苗头，少奇同志深感忧虑：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

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曾是文革初期少奇和小平等领导同志为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所采取的一个果断的措施。尽管这一举措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也向仍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过，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进而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席表态：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以后，工作组就都撤了回来。但此后继续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成为少奇等领导同志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大“罪状”，进而直接导致了少奇同志政治生命的完结。

从看大字报开始的感性体验、调查研究，到对一哄而起的乱揪乱斗派驻工作组进行治理，包括出访归来后有关对文化革命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多次自我批评，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跟上主席的步伐，努力想使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展开，正常地进行。可在思想深处，他似乎又有些力不从心，很难与主席合上拍。非但如此，还往往事与愿违。他没有看清的是，他们的工作初衷与毛主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和斗争策略相去甚远，甚至是大相径庭。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就在这次会议上，我记得少奇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面对上万双热切、期待甚至有些稚嫩的目光，少奇同志没有慷慨陈词，为文化大革命加油助威，而是用平实的语言坦陈了自己的心迹，当时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作为毛主席最为信赖的战友和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竟不知道该怎么搞？！这太让人吃惊了。要知道，在这样的公开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困惑不解，无疑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的。我也向少奇同志投去惊疑的目光，我看到的是写在他脸上的真诚，还有一丝无奈。他不想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应对这些渴望得到指点、得到鼓励的师生们，他只有实话实说，直言相告。虽然不得不站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但他也在千方百计、花尽心思地领悟、理解中，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而实际上，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清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究竟何在？究竟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也许只有毛主席自己明白。

少奇同志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他首当其冲，惨遭厄运。在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中，自己瞬间就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被革命的对象，栽赃、诬陷、揪斗接踵而至，以古稀之躯，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与迫害，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在孤寂与病痛中含冤辞世。

#### ◇ 毛主席的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种行动本身既表明他对文革运用大字报这种形式的一种首肯，更成



为他决心在政治上同少奇等领导同志决裂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仍会很快地把我们拉入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在这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表达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今天我们来看，这不仅明显地主要针对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而且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把党中央内部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以及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且措辞是如此的激烈。

从这次会议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8月1日召开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向全会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重点汇报了前一段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对派工作组一事，少奇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临时改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历数从前清时代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气冲冲地批评了少奇等领导同志“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不准串联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天8月5日，即“炮轰司令部”，拉响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惊天雷。

就在8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针对毛主席“你在北京专政”的指斥，少奇同志也进行了辩驳，讲了他的有名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一方面体现出少奇同志性格中耿直和刚烈的一面，更是他对当前形势急切忧虑的真情流露。这显然招致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编者）

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到会人员，并开展了讨论。这次会议也因此由原定的5天时间延长为12天，转入对少奇、小平同志的批评。当然，大多数的同志都持保留意见，倒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生活会上异常活跃，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当时，5月底刚由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文办主任的陶铸同志，第一个拒绝了她。陶铸同志以他的忠贞正直，没有落井下石，而这也埋下了江青对陶铸同志怨恨的种子。其后，陶铸同志由于在工作中主持正义，极力保护一批遭造反派揪斗的高级干部，因此也不见容于林彪、江青一伙。在他们的搬弄是非下，陶铸同志也很快失去毛主席的信任。此后，作为要被打倒的“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陶铸的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

8月12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林彪由原来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毛主席的

接班人。刘少奇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原总书记邓小平排在第6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确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日后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打击报复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组织上的帮助。

#### ◇ 与林彪理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虽然名义上还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实际上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委碰头会，已经不通知他参加。有关文件、接见等，一概也都停止了。这时还作为内部矛盾处理，还在“挽救”。这期间，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少奇同志等进行“批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没吃饭。散了会以后，我在大会堂的东大厅外接他。出来以后我问：“这么晚了，咱们回家吃饭吗？”少奇同志没说话，径直往西走，一直走到林彪当时住的河北西厅，我跟着也就进去了。推门一看，林彪正在沙发上坐着，也是刚进屋。屋里窗帘拉得很严，都是比较暗的灯（林彪怕风、怕光）。我考虑这么晚了还没吃饭，看他心情也不太好，就走出来跟大会堂的服务员要了一杯牛奶、几块儿面包，并叮嘱不要甜的，因为少奇同志有糖尿病。平时都熟悉，大会堂的服务员很快就给我拿来了。拿了以后，我就端进去了。我说你先喝杯牛奶。这时少奇同志根本没有考虑我让他吃饭的事儿，只听他正跟林彪说：“我有错误、有缺点，但我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会生活会上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在这次会上还纠缠不清？……”这时候，我放下牛奶、点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有纪律：不知道的不能问，知道的不能说，不能跟任何人讲，身边工作人员之间都不能互相说，这是作为警卫人员和机要人员首要的纪律。一直到1979年中纪委要平反了，这句话才说出去。

在此之前，为了顾全大局，少奇同志对有关他工作中的“错误”的指责可以说采取了违心接受的态度，对强加给他的“路线错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罪名，虽然也想不通，但仍表示接受，并多次主动检讨，承担责任。少奇同志善良地以为，经过前一时期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检讨，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没有料到，江青、林彪一伙已经对他伸出了黑手，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一段时期以来，他与毛主席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也使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 ◇ “闲居”的日子

秋天的中南海应是很美的，湖水清波荡漾，堤岸垂柳依依，绿树红花掩映着曲径通幽的亭台楼阁和典雅宁静的四合院。少奇同志居住的地方叫福禄居，是一所宽敞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到春天来临，海棠花儿盛开，繁花似锦，格外绚烂，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秋天，海棠树果实累累，压满枝头，更是带给人一种特别的喜悦。但进入1966年的秋季，中南海里似乎蒙上了一层随处可感的阴霾，海棠花儿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这种阴沉的感觉，它不仅仅是季节的，更是一种早到的政治上的寒意。

这一时期，离开领导岗位的少奇同志，从一直繁忙、奔波的工作状态中一下子闲了下来，显得很不适应。这中间也曾出席一些会议，当然主要是去做检讨。10月1日国庆节，少奇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

在家中的时候，少奇同志绝大部份时间是在看书，或翻阅以往的文件，有时还会看到他倚坐在藤椅上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寻找着不解的答案。烟也抽得更勤了，每次按电铃叫我们进去

时，烟灰缸里都积满了厚厚的烟灰。对习惯于除了睡觉、吃饭外就只知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种“闲居”让他感到痛苦难耐。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能有较多的时间和家人、和孩子们接触了，特别是刚刚6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看书时间长了，光美同志就会劝说少奇同志出来，领着小小，在福禄居的院子里走一走，散散心。几年来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随护左右，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与常人不同的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还有随时可能的出行。而这时，我们更多地是在福禄居这个小圈子照顾他的起居。我看到这一时期的少奇同志面容常有挥之不去的忧戚和苍凉，头发也全白了。只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奔跑在他的左右，大声呼喊着他时，少奇同志的脸上才会现出少有的笑颜，一种作为父亲的慈祥 and 怜爱。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并不能完全冲淡少奇同志心底的忧思和沉重，况且这种欢乐又是那样的短暂，很快被接踵而来的狂风巨浪吞噬了。

1966年的10月，在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之流对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进行点名批判，提出了所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刘、邓黑司令部”成了造反派的行动口号。这一批判运动也由学校迅速铺展到社会，并愈演愈烈，到1967年的新年开始，变成了对少奇同志的公开的围攻进而揪斗。

就在出席工作会议、遭到点名批判的同时，少奇同志还是对所谓的“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虽然已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当前的局面，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不因他而受到牵连。他善良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使已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早日结束。作为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更是盼望少奇同志能够早日过关，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也期盼着主席能出面说话，把处于困境中的少奇同志解脱出来。

虽然已身处逆境，更多的时间是困守家中“闭门思过”，但少奇同志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眼见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上窜下跳，得志猖狂的嘴脸，耳听着一批老将、老师不时被诬陷、被打倒的恶耗，还有社会上到处打、砸、抢成风，甚至武斗闹出人命的惨剧，少奇同志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他不知道，一只黑手正向他袭来，一个巨大的网已经向他张开了，很快，他的善良的愿望被撕得粉碎！

#### ◇ 第一次在中南海写大标语

1966年的冬天显得格外阴冷和漫长，凄厉的北风响过，大地一片萧瑟。中南海里也是湖水冰冻，枯枝零落。福禄居院中的两株海棠树也早已褪去繁华，迎风而立。新年的钟声响过，对很多人来说，它带来的不是辞旧迎新的喜悦，而是对未卜的前途的担忧，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国事焦虑而又身不由己的少奇同志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1月1日新年这一天。这天我值班，具体说是66年12月31日值的班，一直到67年的1月1日。如果说在此之前少奇同志在党内被批判，被降职，对我们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震动，但我们还心怀希望，盼望着很快能有转机，那么67年新年第一天发生的事，则让我感到震惊和不安。

那时中南海里有个电话39局，那里的工人成立了一个造反队，起名叫做“6711战斗队”，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是颇具寓意的，或者说是早有预谋的。这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严冬里的冷风还未刮破黎明的黑暗，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和“咚咚”响声，我起身一看，只见有两个人正在敲我们值班室的北面窗户（我们这个值班室就在少奇同志办公室的边上）。因为都是中南海里的人，他们进来之前我接到了胡同口警卫室打来的电话。

面对不速之客，我警惕地问：“你们是哪的？来干什么？”

对方一扬脖子答道：“干什么？我们要造反！要写大字报。”

在我的追问下，他们报出了具体单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擅自闯入中央首长家中造反，这可非同小可。

我说：“那不行，我得请示上级领导。”

对方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请示，但得快点儿。”

于是我马上请示中央警卫局值班室。当时我打电话报告说39局总机来了几个工人，要到刘家来造反，怎么办？

值班室的人问：“他们要干什么？”

我说：“他们要写大字报。”

“你等一下，我请示了以后再答复你。”

过了几分钟警卫局值班室打来电话：“只可以在院里，不允许进屋。”

因为少奇、光美同志还没有起床，我把这个通知告诉来人：“你们只允许在院里，不允许进房间。”

“可以。”说着这几个人就往里走。

前面说过，少奇同志住的这个院子叫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院，具体说是怀仁堂后草坪的北面，福禄居与怀仁堂的后草坪中间有一道墙。我们值班室是从西边胡同走进来最西边的一间房子里，通往东边少奇同志办公室及卧室有一道门，平时我们把它锁上。所以要进院里，必须要经过我们值班室的这个门。这时他们通过值班室南边的会议室走廊，进来了四五个人，提拎着墨汁、拿着大排笔，直接在院子里的地上写，不是大字报，是大标语。写完之后，我一看，大吃一惊！赫然闯进眼帘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只见那个“奇”字格外刺眼：“大”字写成了一个犬尤，“可”字写成一个句字，乍一看是个“狗”字。把“奇”字丑化，实际是对少奇同志进行人身侮辱。另外还有一条“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写完后，几个人又往少奇同志的卧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长而去。

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这在中南海里还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南海写的第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在此之前，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开点名，尽管他的领导人位置名次靠后了。面对这种恐吓性的侮辱性的标语，我感到震惊和不解：“想不到，堂堂的国家主席，居然顷刻间就以近乎玩闹的形式说打倒就打倒了！虽然这只是几条标语，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而这些工人又是靠了什么公然到国家主席的住地来造反呢？”

不多时，少奇、光美同志起床后来到院里，围着标语看了一下就去吃早饭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

#### ◇ 第一次批斗

过了没几天，1月3号，还是我值班。傍晚5点多钟的时候，天刚擦黑，我听见远处胡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由于已经有了前两天的体验，我估计说不定又是哪个造反派来造反了。果然，我马上接到了胡同口值勤哨兵打来的电话，说秘书局的“红旗兵团”要来批斗刘少奇。前面说过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面，他们要进来，先要经过怀仁堂的西四院（怀仁堂的第一个院住的是李富春同志，第二个院住的是谭震林同志，第三个院住的是邓小平同志，第四个院住的是陈毅同志，叫西四院）。我们住的这个院大门口正对着西四院的胡同口，这里有一个哨兵，离我们卫士值班室有30多米远，一般有情况，会先给我们打来电话。我急忙又向警卫局报告，

警卫局是这样答复的：要批斗，这是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你们看着处理。

说话间，这些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而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正在餐厅吃晚饭，我赶紧拿着大衣（那时是军大衣）、棉皮鞋，带着口罩，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当时我很慌，一边帮少奇同志穿棉皮鞋，一边说：“秘书局的群众组织斗你来了，外边很冷，快穿上吧。”因为是冬天，一感冒就麻烦了。光美同志还没吃完饭，见我这样，忙说：“小贾，别着急、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她见我手也颤悠，系鞋带都系不上了，就赶紧安慰我，稳定我的情绪，实际上她比我还着急：到底来斗什么？怎么个斗法？谁也不清楚。这时我就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帮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因为他是假牙，每次吃饭后都到卫生间洗牙齿，正要到卫生间去洗牙时，秘书局的人已从西门进到了院子里，结果这次也没有洗成，就从餐厅走到了院子里。光美同志也来不及穿大衣了，一起站在走廊的门口上接受批斗。这就是有史以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第一次被批斗。这时已有二、三十个人进到福禄居的四方小院里，站在那里高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刘少奇！”。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严冬里的阵阵冷风吹得人浑身发凉。一开始他们叫少奇同志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扣帽子起哄：“你反对毛主席！”“你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叫少奇同志答复：你为什么说“四清”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交叉？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还进一步解释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死记硬背。听到这里，造反派大声斥责，说是“放毒”，是对毛主席不忠！又继续围攻了一阵儿，最后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每天看两次大字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中南海。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由此开始每天晚饭后去怀仁堂门前的广场上看大字报。大约40分钟后，这个“红旗”造反兵团才撤回去。他们限少奇同志在几日内会背毛主席的几条语录。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大张的纸抄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贴在餐厅、走廊、书房等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红旗兵团”是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手控制的。

大字报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成为造反派标榜自己的所谓战斗武器，也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进行攻击谩骂的惯用手段。记得有一次跟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出来看大字报，碰到了陈毅同志和张茜同志，只见双方相互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默默无语地在一块儿看。很多大字报攻击、诽谤性的语言，令两位首长非常气愤。

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可以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抗战时期，皖南事变后，党中央重组新四军，派少奇同志出任政委，从此，少奇同志与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同志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友情。和平年代住进中南海，两位开国元勋又成为近邻，见面后本应有一些属于人之常情的问候交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高压的环境中，两位老战友都相继失去了人身自由。那时见了面，也只有点头示意，话都不能多讲。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碰面，也有人报告了上去，造反派于是提出，给他俩把看大字报的时间岔开，不能叫他们接头！陈毅看大字报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只能晚上去，白天不能去。从此俩人就再也没有碰到过。

#### ◇ 所谓“智擒王光美”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

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明，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带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导。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

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

## ◇ 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未完待续）

□ 原载《百年潮》2000年第1—第2期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